

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版《劳动合同法》规定,“临时工”享有与用工单位“正式工”同工同酬的权利。

## 同工同酬只是安慰剂,难治体制病

丁是钉

对于一些无药可医的病症,医生很可能会为患者开一些并无实质疗效的安慰剂,以期让患者通过“想象”发生一些“治疗”作用,减轻患者的病痛。

在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版《劳动合同法》中,关于“临时工”享有与用工单位“正式工”同工同酬的权利的规定,对于解决劳务派遣工受到工资和福利“歧视”问题,更像是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的安慰剂。

从“临时工”的分布来看,大量的“临时工”主要是集中在国有企业、事业、机关类单位,尤其是在石油、化工、电信、金融、银行、航空、铁路等系统最为严重,部分央企甚至有超过2/3的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而民营企业中极少有“临时工”。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央企非市场化薪酬和民企市场化薪酬之间有着巨大的“剪刀差”。

众所周知,央企的“正式工”所获得的报酬是远高于其市场价值的超额报酬。现实中,以央企为代表的用工单位,在体制上已经从市场中分离

和游离出来,享受着以其超市场地位所带来的超额利益。从这个角度讲,央企“临时工”和“正式工”不能同工同酬,不是其“临时工”的报酬太低了,而是其“正式工”的报酬太高了。所以从劳动报酬公平的原则上讲,应当是把其“正式工”的劳动报酬降下来,而不是把“临时工”的工资涨上去。

造成央企内部工资分配二元结构的基础是央企和市场化企业的二元结构。“临时工”问题只是因为分配不公表现在一个企业内部而显性化、突出化了,更本质的问题是由于非市场化企业的存在,造成了整个社会在薪酬分配层面形成严重的二元结构。客观上看,央企“临时工”拿到的工资才是其真正的市场价值,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大量的央企“临时工”一定会选择用脚投票,到市场上寻求其他工作机会,而不是呆在央企内部寻求报酬“公平”。

作为调整全国范围内劳动关系法律,从本质讲,其所关心不应当是具体某一类单位内部的分配公平,而应当是全国范围内更普遍的劳动报酬公平。也就是说,不能单纯关注

和调节一个单位内要实现同工同酬,而是要着眼于整个劳动力市场上实现同工同酬。从逻辑上讲,真正的劳动收益公平应当是在劳动者能力禀赋相同、劳动强度相同、劳动风险和危害相同、劳动时间相同的情况下,实现央企内部劳动分配公平,是违背企业用工和薪酬市场化方向的。其结果会导致一些新问题的产生。

首先,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央企在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会把大部分原来由企业内部的“临时工”所承担的工作,通过业务外包的方式交由相应专业公司来做,以规避法律风险。比如把保洁工作承包给保洁公司,轻松把新法的效力化于无形。而要实现同工同酬,也要先实现同工。而现实情况是,比如保洁、保安等工作,可能根本就没有“正式工”在做,因此也就无法作为“同工”的参考指标。

其二,对于个别央企高管来说,

这是安排自己相关利益人员的好机会。由于央企的超高薪酬,央企用工已经形成了内部“繁殖”的态势,内部关系盘根错节。只是因为严格的指数限制,才有更多的裙带关系进入央企。新法从某种意义上等于为央企进入人开了口子,更多“官二代”、“富二代”会靠“拼爹”进入企业。

其三,如果个别央企依照这个法律行事,不是降低“正式工”工资而是提高“临时工”工资,显然会大幅度增加用工成本,在其成本偏高竞争力已经很差的前提下,这无异于让其自杀。

央企内部“临时工”和“正式工”的薪酬差距只是一个表象,其背后的真实原因是央企用工和薪酬非市场化的体制性问题。破解这个难题的现实路径是允许央企大量地使用“临时工”,以此逐步降低“正式工”的比例,直至央企中“正式工”不再存在,才能实现央企市场化的和平演进。

如果是由于新法实施导致央企“正式工”大幅度增加,相应加大了央企用工市场化的成本和难度,用安慰剂去治体制病,岂不会贻误央企非市场化顽疾的治疗?

锐评

## 莫让企业沦为地方增收“待宰羔羊”

事实证明,在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减缓的时候,往往也是企业日子最艰难的时候。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政府部门,如果没有能力去拉它们一把的话,至少不应该成为把它们推下悬崖的罪魁祸首。

孟志强

近日,曾经创造了经济飞奔神话,一度被称为“北方小香港”的鄂尔多斯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一次引人关注的不再是让无数人羡慕嫉妒恨的财富传奇,而是因为当地的“财政恐慌”。

这座依靠“羊、煤、土、气”等资源优势,GDP总量一度成为西北第一,人均GDP超过香港的西部新兴城市,似乎正在陷入萧瑟的寒冬之中。数据显示,近年来财政收入规模一直稳居内蒙古第一位的鄂尔多斯,今年1—5月份财政收入均为负增长,增速在内蒙古垫底。

据媒体报道,由于鄂尔多斯财政收入形势严峻,已经引起区、市两级政府部门的关注和担忧。上月中旬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相关领导专门就此奔赴鄂尔多斯调研,分析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并探讨可能的财政增收路径。

然而,这些与增收有关的对策不禁让人有些担忧,让人怀疑地方政府部门是否开错了药。据悉,当地财政局官员向媒体介绍称,目前该地财政增收,主要是从过去“跑冒滴漏”的税

收欠款中挖掘潜力。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的逻辑,有钱的时候可以对企业拖欠税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政府都缺钱了,怎么还能允许企业拖欠税款?事实上,不少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就是这么做:平常企业想拖欠税款就拖欠点,一旦财政吃紧,企业就成了政府的“待宰羔羊”。

去年年中,因为难以承受“清理欠税”的压力,中小企业叫苦不迭的情景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彼时,部分地方政府因为土地财政断炊,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财政收入告急。为了确保财政增收,一些政府部门就把目光转向了企业往年的欠税和一些原本可收可不收的“弹性空间”。在重重压力之下,一些本就负担沉重的中小微企业不得已选择注销营业执照,以逃避各种税费的方式运营。另外一些中小微企业则直指政府“清理欠税”和征收过头税成为压倒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实上,此次被鄂尔多斯市作为主要清欠对象的煤炭支柱产业,今年的日子并不比上述中小企业的日子好过。去年以来,全国煤炭市场一直处在低迷状态。一方面煤炭的销量上不去,另一方面是价格太低。受市场因素影响,鄂尔多斯市有21%的地方

煤矿已经停产。多位鄂尔多斯当地的中小煤炭企业负责人向媒体反映,依照目前的市场行情,鄂尔多斯的煤炭价格已经跌到了当地企业生产成本的边缘,甚至粉煤价格出现了倒挂的情况,企业只有通过减产,才能减少不必要的生产费用和损失,此时不减产,就意味着亏损。没有减产的企业也是挣扎在成本线上,减产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政府的清欠措施会不会成为压倒这些煤炭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现在又到了年中的敏感时刻,不少地方又开始为完成上半年收支预算“双过半”的目标开始忙碌起来。这时候我们尤其需要警惕,要防止中小企业因被突击征税而濒临破产。毕竟,如果这些企业都没有了,政府税收就真的成了无米之炊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全国相当多地区的财政收入目标未达到年度预期,仅从前5个月地方财政收支来看,如果不算上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不少地方出现了较大的收不抵支的情况。其中内蒙古、陕西、河南、辽宁等地均表现明显。部分地区财政收入甚至接近于零增长。

对此,各地已经开始加强税收征管力度。以内蒙古为例,内蒙古财政厅在5月上中旬组成10个组,督促各地确保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任务。5月24日,内蒙古财政厅办公会议,再次明确要求努力实现全年财政收入目标任务。5月份内蒙古政府办公厅还转发了《关于狠抓财政增收节支有关事宜的通知》。

地方政府部门的急切心情可见一斑。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政府部门必须更多考虑“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所带来的后果。事实证明,在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减缓的时候,往往也是企业日子最艰难的时候。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政府部门,如果没有能力去拉它们一把的话,至少不应该成为把它们推下悬崖的罪魁祸首。殷鉴不远,愿相关政府部门深思。

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坦承要用简朴的政府来取信于民,造福人民,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地方财政趋紧之后,是自己过紧日子,给企业更多生长空间,还是把企业当做“待宰羔羊”,不管不顾对其予取予夺,竭泽而渔?这个选择不仅关乎企业的生存,更关乎中国的未来。

来论

## 放宽户籍制度仅仅是城镇化的第一步

邢滋沂

6月2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这是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也是2013年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城乡有别的二元化户籍制度,已经成为阻碍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参与城市建设的主体的身份不明确,城镇化工作就难以顺利开展。因此,全面放开小城镇、有序放开中等城市,逐步放宽大城市等的落户条件,降低城市户籍门槛,将成为城镇化建设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根据地城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划分为农业户

口和非农业户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元户籍制度。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这种制度造成的发展局限和弊端也日益明显。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社会要有可上可下的人口流动,才不会变成僵化的社会结构。我国的户籍制度在限制人口流动时不仅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同时也限制了城市居民的流动性,这对于我国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非常不利。

同时,因户籍差异而造成的待遇差别也颇具争议。户籍像标签一样划分了本地人和外地人,并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联,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城市特权”,进而直接或间接地拉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公造成了城乡收入分配不均,所以加剧了城乡割裂,造成社会分化。

以上弊端决定了城镇化必先打破户籍差别入手。眼下,城镇户籍制度放宽已经向前迈出了第一步,但还未完全“松绑”。这一步迈出之后,还有很多路要走。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城镇化绝对不是单纯的户口的城镇化,不是将所有农民都转为城镇居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镇户口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那些优越性已经完全没有了。一纸城镇户口,并无法解决人的生存与生活问题,更无法保证幸福感和中国梦的实现,在户籍制度放宽的情况下,还必须打破落户壁垒。

农民进城后,最担心的是什么?是子女教育、医疗以及养老等问题,是与社会保障有关的种种权益。只有保证公民在迁徙后享有的权利平等,才能真正做到城乡居民的地位平等。均化公共服务是改革的一个难点,它不能

通过政策直接“一刀切”,要通过循序渐进地引导来减少矛盾。实现这个过程比放开户籍更难,由“高门槛,一次性”到“低门槛,渐进式”获得权益,恐怕不是三年五年的事。

农民成为城镇居民之后,他们的生活与保障性服务也要跟上,首先要解决他们的住房、就业问题,要避免农民转为城镇居民之后,失去住房和生活来源。同时,也要加强教育投入,解决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要进一步完善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让他们病有所治、老有所养。这些不仅是他们面对的问题,也是政府需要思考并回答的问题。

显然,放开户籍限制,只是城镇化的第一步,而且只是一小步,接下来还面临着户籍放开后的种种难题。让农民进城梦变成现实,过上美好生活,还有很长路要走,我们不必高兴过早。

## 从“钱荒”读懂中央政府救赎实体经济的意图

(上接第二版)

差钱的是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从投资数据上看,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上半年拉动投资的主要动力。前五个月,房地产投资增速为20.6%,比去年同期高两个百分点。而代表生产类企业增长的工业投资增速却在不断走低。有些银行宁愿追着城投公司贷款,都不愿意给生产类的企业贷款。目前实体经济不振,很多企业效益也不好,还不如将钱投给城投公司,因为这可以算是准政府债务,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危险的是,这些领域的信贷风险正在积聚。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负债率在最近几年的信贷高速增长中都出现了大幅的攀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周货币市场的动荡可能是未来几年金融体系动荡的开始而非结束。

一场中国式“钱荒”仍未散去,如果坚持增量投资刺激的思路,中国的“雷曼时刻”一定会到来。

### 盘活货币存量救企业的新政

回顾近月来的变化,可以凸现一条思路。

6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这实际是“李克强经济学”的货币思路初现端倪。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李克强对于“存量”的提法公开的就至少已有3次。在此之前,他还分别在5月13日的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和6月8日的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在存量货币较大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较高”,并称“要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总理盘活存量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控制总量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是要把原来在金融体系里自循环的货币通过一些载体输送到实体经济里。显然,决策当局这一提法,意识到了金融与实体密不可分的关系,是看到了本质,抓住了问题。

也许是李克强总理看到,中国货币存量的规模很大。当朱镕基总理于1998年3月就任时,货币余额仅有9.2万亿元;至五年后的2003年,温家宝总理就任时,此数字已经突破20万亿元大关。随后的短短两年中,M2余额就接近30万亿元。而后一个个整数关口就被轻而易举地突破,至今年5月达到了104万亿元!

也许是李克强总理看到,这些钱所带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却很低,存量债务规模庞大,落后产能仍在逆势开工,资金被无效消耗,或干脆停留在偿债环节。

可是,究竟何为真正意义上的存量?又该通过什么手段才能将其盘活?想要得出一个完整的答案,正是中央政府眼下该做的事。

简单地说,“盘活存量”,要“有保有压,有控有扶”。控和压,就是严格控制不再增加新的贷款,收回来的资金要压住不再投放出去,而对于要保、要扶的,还是要继续增加贷款,这就实现了结构调整。

国务院的用意正是力图以金融之手,通过市场的调节让资金流向最该去的地方,科技型企业、保障房、经济适用房、文化创意产业、小微企业等,被一些银行业界人士认为是信贷结构调整后的投向,对科技型企业和服务业的支持,恢复经济结构平衡,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目标。

理解决策层“盘活存量”这步棋的用心与决心,从银行、投资机构到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商务部、国资委等有关部门都在等待决策层的下一步动作,准备自己的下一步。

据悉,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讨论稿,将在各部委征求意见后,以国务院名义在近期下发,国新办也会为此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

### 两条发展道路的抉择

李克强正式就任国务院总理至今已经100多天,在今年经济增速下滑几成定局的严峻形势下,市场一直未见政府出台财政或货币刺激政策,有些人就觉得他在应对经济问题上的动静不大。实际上,100天的经济新政框架已经形成,这就是“紧货币,松市场,转实体”。就是管好政府自己,管好央行,放开对民企和市场的管制,引导投资转向实体经济。

李克强总理前阵说,“如果过多地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拉动来刺激增长,不仅难以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这就是充分认识到了短期刺激政策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本身就是问题。所以不再搞刺激政策,本身就是解决大问题。对待“钱荒”不肯“放水”,本身就是大动作。

到底是2008年的危机更可怕还是后来政府的过度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更可怕?是危机本身更可怕还是不正当的救市更可怕?是该说清楚的时候了。立足长远,就要货币纪律加市场自由双管齐下,让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起来,用改革红利替代货币幻觉,中国新一轮可持续繁荣就指日可待。

五年来,围绕在政府与银行周围的主流力量是“救市派”,总是呼吁开闸放水,以缓解流动性紧张的矛盾。前阵子“钱荒”到了,这种舆论极其强大。这些人不少是楼市、股市中的“弄潮人”。他们一味地忽视社会舆论,忽视企业的生存状态,更忽视了新的政策迹象,总是维护旧的决策思路。

进入七月份,国务院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将是一场抉择的转折点。“钱荒”风波将被政策导向何方,中国实体经济在这种货币存量改革中能得到多大益处,命运攸关,万众瞩目。

中国救赎实体经济的道路面临一个十字路口,数千万企业与银行都在期待着。